

对外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

刘洪愧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作者简介: 刘洪愧, 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异质性影响及理论机制研究”(72003193);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始终在努力探索形成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交往中加速推进。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对外开放的中国经验。主要包括: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经贸关系;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国内经济政策,如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始终注意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因素,统筹开放与安全。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服务于国内经济增长和人民需求,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更好更快发展,同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推动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启示、新思路和新选择。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对外开放; 经济政策; 统筹开放与安全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23)05-0005-10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①这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一直在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实践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交往中加速推进,体现了对外开放的中国经验。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通过对外开放实现现代化,甚至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属物。那么,对外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有何关系?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经验有哪些?

一、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分析

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看,现代化指世界各国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变革与转型过程,主要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以及相应的制度变革。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掌握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率先开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通过海外扩张、殖民掠夺使全世界卷入由它们主导的世界性的现代化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目前,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和少数非西方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这也表明发展中国家需要借助对外开放和世界市场来推进现代化。

一方面,这是因为现代化是在全球化中推进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实现现代化。即使是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需要世界性的产品市场、劳动力以及资源能源。马克思指出:“这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①同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需要世界市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对外开放,才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参与全球生产分工,进而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对外开放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要素和资源,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促进生产力不断提高。在对外开放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力来获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加快其现代化进程。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将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那些不适应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将被替代,引起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变和社会风貌的变化。

虽然对外开放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并不必然使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需要付出很大代价,需要依附于发达国家制定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一些国家主权、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发达国家还为此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和叙事体系,如依附理论、中心—外围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国家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国的发展需要以另一国的发展为前提。但事实上,发达国家凭借其在规则制定、产业发展、科学技术、资本要素等方面的优势,往往使发展中国家依附在它们主导的产业链中,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获得很少的增加值,甚至陷于中等收入陷阱。西方学者进一步构建出“霸权秩序论”,认为需要一个实力超强的霸权国家主导全球事务,发挥全球治理功能。二战以来,美国开始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霸权秩序,霸权秩序论本质上是为美国的霸权统治强行辩解。在霸权秩序论下,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经常遭受不公正对待,面临各种不利因素,难以稳步推进现代化。正因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后并没有步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良性轨道,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或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不仅要积极主动对外开放以融入世界市场,更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争取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经贸关系,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同时统筹对外开放和安全发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更艰巨、挑战更大,因此,更需要对外开放。特别是,我们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学习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并通过对外开放来扩大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力。

第一,在生产力的方面,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快速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对外开放使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可以更好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体来看:一是使中国企业全面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通过“干中学”不断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企业组织方式和管理经验,同时促进形成和完善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在此过程中,中国成为拥有全球最完整产业链的国家,成为全球三大价值链(包括东亚、欧盟和北美)中东亚价值链的中心。二是对外贸易顺差使中国积累大量外汇储备,成为中国货币发行之锚。中国人民银行借此可以不断扩大资产负债表,发行大量人民币,给经济注入充足的流动性。三是对外开放所引进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内资外贸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稳步提高,推动中国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四是在吸收全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过程中,中国不断提高科技研发投入,逐渐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和技术体系。五是外贸企业贡献了大量税收,中国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充足的流动性和财政资金供给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16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以更快速度增长。六是外贸和外资形成的国外需求也刺激国内需求的扩大。除了出口增长，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消费快速提升，形成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因此，可以说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跨越式发展。一是对外开放助力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1978—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八年翻一番，远高于同期世界2.9%左右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世界第11位攀升到2007年的第3位，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党的十八大以来(2013—2021年)，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年均增速为6.6%，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仅为2.6%^②。二是中国工业化成效显著，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目前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③。三是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实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22年的65.22%^④。四是在社会民生事业等方面也取得显著成绩。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亿二千万人拥有基本养老保险，十三亿六千万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⑤。

第二，在生产关系方面，对外开放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之所以较高，除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外，还在于其市场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中国不仅重视学习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而且逐步形成和完善了适合现代化建设的生产关系和资源配置方式，这集中体现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设想的是在生产力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并没有设想社会主义如何利用市场经济来提高生产力。这导致许多人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但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既然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创造了更先进的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也可以使用。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⑥这一论断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观念，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离开，党的十四大据此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⑦中国也因此“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⑧。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由此推动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继续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推动作用也更大。此后，中国对外开放不仅是利用外资以及扩大出口赚取外汇，而且是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开放国内市场，进入国内国际双向开放的新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逐步由特定地区、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有限局部开放转变为全国层面、绝大部分行业和领域的开放，由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国际规则体系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的对外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间的双向开放。这种对

① 国家统计局：《波澜壮阔四十载 民族复兴展新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

② 国家统计局：《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③ 黄群慧：《2020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11期。

④ 1978年数据来自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2022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7版。

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⑧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页。

外开放实践也加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 WTO 要求中国与世界经济进一步融合,要与世界通行的经贸投资规则相衔接,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例如,在加入 WTO 后的五年考察期内,中国的总体关税水平从 2001 年的 15.3% 降低到 2005 年的 9.9%,其中工业品关税降至 9.3%,农产品关税降至 15.3%。在投资方面,2004 年就对照入世承诺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和禁止类产业很少,绝大部分都属于鼓励类。加入 WTO 也成为国内改革的催化剂,中国大幅度修改不符合 WTO 规定的国内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营商环境大幅改善、政策透明度持续增加、政府服务意识显著提升^①。加入 WTO 十年间,中国各级政府对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大范围修订:中央各部委清理 2000 件左右,修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地方政府清理与调整的法规、政府规章和其他政策措施数量更为庞大^②。中国由此建立起与 WTO 国际规则相容、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也因此推进了价格、劳动、分配、投资、金融、户籍、产权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不断改革和完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和上层建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推进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了更加完善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构建了空间布局比较完整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推动中国更大程度地制度性开放。2013 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建省 30 周年大会上宣布在海南全省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2013—2020 年间,中国共设立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海南自由贸易港),总面积将近四万平方公里,成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平台。二是大幅度放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是汽车制造业,银行、保险、证券、教育等服务业。在 2011 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基础上,中国连续三次修订,分别出台该目录的 2015 年版、2017 年版和 2019 年版。2017 年版将限制性措施减少到 63 条,比 2011 年版总计缩减 65%,2019 年版进一步增加鼓励类措施。2019 年,中国出台新的《外商投资法》,并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明确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同等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明确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和政府采购活动,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保护。总体看,不管是自贸试验区还是新的《外商投资法》,对外开放的重点已经不是以往的市场和要素开放,而是侧重于构建更加规范、透明、公平的制度性开放体系,形成对内资和外资同等对待的竞争中性市场环境,使它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都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和世界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不仅提供了现代化的典范和案例,也提供了现代化的方法和路径。新阶段的对外开放包括两重含义(即两个互补的组成部分):一是通过对外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继续发展;二是中国主动“走出去”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完善世界经济格局,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在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侧重于前者,对后者的关注相对不多,这主要由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同时也因为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本较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更多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对外开放在这个阶段的意义也在于,使得更多发展中国家观察并借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实践,由此形成广泛的世界影响力和世界意义。

中国对外开放理念的变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植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因素。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始终注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希望通过中国经济发展来推动世界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2013—2021 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38.6%,超过七国集团贡献率总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③。二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了世

① 袁元、苗俊杰:《中国入世五年历练》,《瞭望新闻周刊》,2006 年第 49 期。

② 裴长洪、郑文:《中国入世 10 周年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变化》,《财贸经济》,2011 年第 11 期。

③ 国家统计局:《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

世界经济平衡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全球经济治理理念与以往的世界经济平衡观有本质不同，旨在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平衡^①。中国希望“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②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平衡观与以往的“霸权秩序观”有本质区别。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进口博览会成为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前者开创了新的经济地理和贸易分工方式，使得世界经济的地理分布更加平衡；后者使得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加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成果。三是对对外开放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反对霸权主义，积极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就没有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在与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推进的。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企图以霸权主义的方式逼迫中国让渡国家权利，对此中国坚决予以回击。同时，中国灵活接受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要求，这些经贸规则虽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但也有其合理性，维持了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虽然许多国际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主权有冲突，但是中国还是积极接受，特别是在加入 WTO 的过程中以及加入之后，为了适应 WTO 对成员国的要求，中国不断修改国内法律法规及各项制度，让渡了一些国家权利，但是也因此获得其他国家对中国权利让渡，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坚定维护 WTO 等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同时，在国际经贸规则发展新趋势下，中国积极商谈签订了诸多区域贸易协定。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各国要全力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实现共同可持续发展，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的发展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往的现代化模式，给发展中国家新启示、新选择。

二、 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平等的经贸关系

上文理论分析表明，对外开放并不必然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这首先是因为在现代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依附理论、霸权秩序论都暗含这一点。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始终坚持在平等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对外经贸关系，而不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这样才能确保对外开放始终服务于国内的现代化。这也成为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条经验，且为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所证明。

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外交、海关、外贸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或其买办的控制下。这决定了当时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是被动的、从属的而不是主动的、平等的，只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附属物，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因为这种不平等的对外经贸关系不可能有利于国内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无助于国内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废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相应的一切特权，特别是收回长期被英美霸占的海关管理权，在此基础上与各国开展平等的经贸谈判。但这损害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虽然很希望同新中国建立经贸联系，但要求附加一系列不平等条件，没有将新中国看成与其平等的主权国家，要求新中国必须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这当然不可以接受^③。因此在当时，中国只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平等的经贸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这些国家进口了一些重要物资如运输设备、机械设备、钢铁、石油及其制品、化工原料、种畜等，对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帮助下，建设了 156 个大型工业项目，使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

① 刘洪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7 期。

② 裴长洪、刘斌：《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构建阐释中国开放成就的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2 期。

③ 裴长洪：《融合世界一切先进事物 推进人类共命运——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开放观》，《教学与研究》，2021 年第 6 期。

但在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苏联提出一系列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并以中断技术援助和经贸关系来威胁,这当然也不可能被中国接受。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新的重要变化。毛泽东据此提出三个世界的论断,指出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即第二世界发达国家,同它们开展经贸往来对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这些国家也愿意同中国建立平等的经贸关系,中国因此同许多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等)建立经贸联系,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从这些国家大规模引进外资和设备,包括冶金、煤炭、石油、机械、电子、化纤、化肥等大型成套设备的进口,成为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推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早期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指出中国要更加大胆地对外开放特别是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开放,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要素来推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是,中国仍然强调在对外开放中要坚持平等的国际关系,对外开放的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不是再次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1982 年,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①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②这种平等基础上的对外经贸关系使得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被迫让渡国内权利。这种让渡国内权利的行为在依附理论或霸权秩序观下的全球化中普遍存在。当然,在必要的情况下,中国可以主动让渡部分国内权利,但这是基于发展需要的主动选择。

在这种平等的对外经贸关系思想指导下,中国拥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体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体制符合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虽然这一多边国际体制仍有效运行,但已不符合美国的利益。2018 年以来,美国对世界打响贸易战、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颠覆了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经贸规则,经常不遵守、不执行联合国的决定。这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多边体制构成较大威胁,使得世界日益分裂。对此,中国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坚定反对美国的“逆全球化”行为,坚定地维护联合国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能够在平等基础上同各国建立经贸关系,最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来组织和协调分散且有限的资源要素,那么现代化建设事业就根本不可能顺利推动^③。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一系列救国方案之所以无法成功,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一个先进且独立于外国势力的领导集体。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就不可能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将始终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附庸的地位。

中国的改革实践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体明显不同,后者的失败经历也从反面验证了中国实践的正确性。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如拉美国家采取多党轮流坐庄政治制度,但其底层制度和组织并不完善,最后往往蜕变为极端民粹主义,导致国家陷入持续内耗中,始终无法形成经济发展的合力。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东欧转型经济体则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幻想在一夜之间就顺利转型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当然也不可能成功。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就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为人民服务的领导集体来整合国内各种力量,从而容易被西方国家利用,导致国家能力无法提高,难以投资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赖以需要的各类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

三、 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 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

对外开放使本国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资本、货物与人员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本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年,第 29 页。

③ 刘洪愧、邓曲恒:《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分析》,《经济学动态》,2022 年第 6 期。

经济随世界经济的波动而波动，也使本国经济政策必须与国际经贸规则以及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保持一致，本国很难维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不利现代化建设。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基于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主动或者被动放弃了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以致无法顺利实现产业升级，无法建立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甚至在国际负面冲击下出现国内经济危机。中国在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摸索出“渐进式”的改革开放理念，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内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在适应国际规则与保持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之间取得了较好平衡，使得对外开放始终服务于国内现代化建设。

第一，汇率和货币政策。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认为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兼得。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的鼓动下过早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而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利用货币政策稳定国内经济的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始终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来选择合适的汇率政策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在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3年)，中国从单一汇率制转变为较为灵活的双重汇率制，经历了官方汇率与外贸内部结算汇率的共存(1981—1984年)以及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共存(1985—1993年)两个时期。这种汇率双轨制既有利于维持外汇市场稳定，又有利于企业获取外汇促进发展。1994年中国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汇率制度改革，将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行结售汇制度。面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收窄了汇率浮动区间，但危机缓解后又进一步放宽。2005年7月，中国对汇率制度进行更大幅度的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波动幅度更大，也使得人民币进入长时间的升值通道。

在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中国1996年就实现了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之后开始有序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在直接投资领域，自2002年起就简化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在证券投资领域，开始是引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之后推出RQFII和RQDII，并不断放宽投资金额限制，实施“沪港通”、“深港通”、“熊猫债”和“债券通”等诸多创新安排。在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方面，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设计的40类交易项目中，中国20世纪末大约90%以上的资本项目都是不可兑换的，但目前不可兑换项目仅四项，占比10%；部分可兑换项目为22项，占比55%；基本可兑换项目达到14项，占比35%^①。这一政策顺应了国际社会的诉求，说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和资本国际流动制度也有助于增强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使得中国经济更有韧性，避免了类似亚洲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等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第二，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独立自主主要体现在严格控制外债规模，防止外债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或者成为发达国家干涉中国独立自主的筹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储备较少，存在较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国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国际组织的低息贷款，但严控外债规模。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热衷于借外债，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国家以及21世纪以来的部分欧洲国家。虽然这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快速发展，经济出现了表面的繁荣，但是外债一旦超过GDP的一定比重或者超出其偿还能力，就会影响正常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发展的负担。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希腊、冰岛等发达国家都曾因无法偿还外债而变卖国家资本或者导致政府破产。一些国家也因为无法偿还外债而被迫接受债权国的债务重组，不仅无法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也严重影响国家信用。

第三，贸易政策。中国的贸易政策主要涉及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个方面。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对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性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例如外资企业在国内的投资享受一系列税收和土地方面的优惠待遇，加工贸易企业的关税优惠政策更加明显。对于内资企业而言，中国也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鼓励出口。此外，中国还实施产品层面的差别性关税政策，确保在对外开放促进进口的同时，保护扶持国内幼稚产业发展。这种独立自主的灵活贸易政策既有利于引进外资、扩大对外贸易，使得中国

① 张礼卿：《对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进程的一些观察与思考》，《国际金融》，2021年第11期。

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又可以保护和带动国内产业发展,加快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步伐。

第四,产业政策。改革开放前,中国就基本建立起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实行独立自主的产业政策奠定了基础。但改革开放前,中国更加重视重工业的发展,1978 年重工业占工业比重达到 56.9%,但也造成轻工业发展滞后,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健全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先发展轻工业,补足了改革开放前的轻工业短板,然后在轻工业得到充分发展以及获得的资本积累基础上,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对机械制造、化工、交通运输等重工业进行升级改造。因此,虽然中国隶属于全球生产体系、加工贸易占很大比重,但具备独立自主的轻工业与重工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工业与农业产业体系。目前,中国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中类、666 个小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就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到 2019 年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是美国和日本总和^①。中国的出口结构、产品质量、技术复杂度等都不断提高,已由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到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这同样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中国坚持实施“五年规划(计划)”,选择每个时期需要重点发展的产业和行业,在政策、资本、土地、信贷资金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升级和出口增长。

四、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统筹开放与安全

开放型经济必然面临更多更大的风险因素,国际社会的各种政治经济冲击都会传导到国内,引发国内经济波动和危机。因此,如何统筹开放与安全一直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本就脆弱,又没有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进而引发国内经济危机,现代化进程被迫中止。这也意味着,对外开放既有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方面,也有增大中国式现代化风险的方面,需要统筹推进对外开放与安全发展。

第一,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基础上采取渐进式开放策略,最大程度降低对外开放的风险。中国始终根据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需要来选择开放的时机、领域、方式、速度、节奏,并动态调整。中国也坚持在对外开放中不断化解各种内外矛盾,“摸着石头过河”取得经验,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来突破体制束缚,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转型开辟道路^②。

一是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选定四个经济特区试点对外开放,然后扩展到多个沿海城市,再扩展到沿江沿边城市,并设立一系列海关特殊监管区、出口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对外开放区域。2013 年开始,中国设立多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主动对接最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目前已在全国范围设立 2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方式也经历了突破性变化,从鼓励外商投资的正面清单到法无禁止即可投资的负面清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数量从 2018 年的 190 项降低到 2021 年的 27 项。在负面清单之外的行业,外资均可以自由投资,这极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不确定性,扩大了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使得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持续稳步增长。

二是从商品要素开放过渡到规则、管理和标准的开放。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更多地是要利用外资来扩大出口、获取外汇,因此,采用的是政策优惠型对外开放,侧重于商品要素的跨国流动。目前,中国主要是要构建竞争中性的对外开放政策体系,对国企、外资、民企一视同仁,鼓励它们相互竞争,做到规则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统一。

三是从利用外商投资到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从全方位对外开放到共建“一带一路”。利用外商投资和全方位对外开放都是以外促内,即通过国际循环来促进国内大循环。但在国内大循环得到扩大和巩固基础上,“走出去”和共建“一带一路”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与推动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

① 参见:《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9 年 9 月 20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0/content_5431714.htm, 2023 年 8 月 20 日。

② 裴长洪:《中国对外贸易 65 年的基本线索:变革与增长》,《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 年第 3 期。

选择，它不仅是主动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而且是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中国因此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第二，在对外开放中始终警惕各种现代化的风险因素。一是对外开放伴随汇率风险与资本跨国流动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和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就是鲜明案例。中国吸取了这一教训，始终保持中国外汇和资本市场稳定。事实上，二战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很长时间内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各国货币相对美元基本稳定，降低了企业对外贸易的汇率风险。直到美元不断增多导致“特里芬两难”问题出现，固定汇率制度才无法维持，世界才进入浮动汇率时代，但也给外贸企业造成较大汇率风险。一方面，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从而给企业以稳定预期，避免汇率风险侵蚀企业利润。这也避免了美国通过货币政策和汇率变化来加剧中国经济波动，避免美元周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不断积累外汇储备，不仅为中国购买国外资本、技术、资源能源提供资金，也是稳定汇率的基本支撑。丰厚的外汇储备使中国拥有强大的购买力，成为吸收外资、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购买资源能源的基础，这些都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部分。

二是重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同时严格管控国际投机资金。中国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始终保持风险可控、循序渐进的谨慎态度，最初只允许投机资金通过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少数渠道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待资本市场相对成熟之后才不断放开限制，到近年逐步开通“陆港通”和“沪伦通”等，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不断紧密和深化。这也是中国由实体经济开放到资本市场开放的必然之举，这一举措被证明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这也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不同，有效避免了一些国家经历的各种经济金融危机。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东南亚等高度外向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受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很大。但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估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稳定国内经济的能力，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制度，另一方面过早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导致国外投机资金大量流入引起经济虚假繁荣。这些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储备来稳定汇率，一旦遭遇国外资本大幅流出的冲击，外汇市场和金融系统就陷入严重紊乱局面，并影响实体经济的稳定，对其现代化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同样，在 20 世纪 80 年代，部分拉美国家高估自身偿债能力，在低利率的诱惑下借入大量美元债务，超过了其偿还能力。一旦美国利率上升或者这些国家国内经济增速下降，大量美元就流回美国，这些国家也就陷入巨大的债务陷阱中。严重的债务负担使得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陷入漫长的经济停滞时期和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吸取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采取谨慎的汇率政策，循序渐进开放金融市场，最大程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但对投机性金融资本始终保持谨慎态度，从而实现了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没有发生大的金融危机，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平稳推进的重要原因。

第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重视统筹对外开放与安全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是其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竞争更加激烈，风险因素显著增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①。“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②在这种新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开始重新审视对外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统筹发展与安全成为新的指导思想，全球价值链向区域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转变。与此对应，世界各国各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不断增多，对外资的审查也趋于严格，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外资进入。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挑战包括：一是美国要求甚至逼迫中国放弃对外开放的自主权，在无法得逞的情况下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二是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产品、高端零部件、农产品等对外依存度仍比较高，使得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始终存在安全隐患；三是随着中国在更多领域特别是科技、资本和金融领域开放度提升，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金融造成的风险也更大。因此，对外开放也内在要求中国统筹开放、发展和安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年，第 164 页。

②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8 月 25 日，第 2 版。

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 加快补足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和“卡脖子”问题。对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推进对外开放中要注意两点: 一是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 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 我们都要积极开展合作,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二是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 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①。

结 语

对外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 不允许其他国家以干涉国家主权为前提的不平等经贸关系存在。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中国也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国内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 始终注意对外开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因素, 统筹开放与安全。这样的对外开放实践确保了它始终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 利用国外资源要素来帮助完善国内工业生产体系,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更好更快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希望将发展中国家禁锢在由其主导的全球生产分工和价值链体系中, 并不希望后者完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而是旨在将发展中国家打造成它们的经济附庸。对此,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市场理论很早就指出, 世界市场之所以对资本主义非常重要, 是因为它能够把价值发展为国际价值、使得剩余价值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实现, 从而扩大市场并提高利润率。因此, 如何避免发展中国家这种参与全球化的陷阱, 就成为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重要课题。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企图。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平等的国际关系、独立自主的国内经济政策, 同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启示、新思路和新选择。

(责任编辑 孟大虎 责任校对 孟大虎 武晓阳)

Opening up 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Summary

LIU Hongku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been working hard to explore a modernization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especiall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s been accelerated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Historical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opening-up polic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flecting China's experience i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summary, it mainly includes: China has always insisted on establishing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it has always maintained independent domestic economic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rate policies, monetary policies, fiscal policies, trade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it has always paid attention to various risk factors and coordinating opening-up and security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China's practice of opening up ensures that it always serves domestic economic growth and people's needs, and promotes better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opening up, China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advocated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provided new enlightenment, new ideas and new choic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mote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opening-up practice.

Key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opening up; 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ng opening-up and security

^① 《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